

王明著



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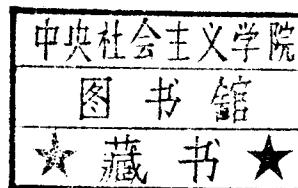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223/

67951

DG6.1.04
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

王 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

王 明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通县潮白印刷厂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302 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8,101—13,600册

统一书号：2190·081 定价：2.30元

序　　言

道家和道教两个术语，有联系又有区别。习惯上有时把道教也称为道家。说严密些，道家和道教不是一回事。

道家属诸子的学派之一，是一种哲学的派别。如先秦的《老子》、《庄子》以及后世的《阴符经》都属道家，它们本身都不是宗教性质的书。至于后来有些道教徒注释《老子》、《庄子》和《阴符经》，那是另外一回事。道家的思想跟后来道教的理论有某些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有根本不同和相反的情况。

《老子》五千文，有不少神秘的语言，能为宗教所利用。东汉时，原始道教一个派别五斗米道的祭酒主诵习《老子》。同时托名河上公注的《老子章句》和《老子想尔注》都是专门宣扬道教的典籍。桓帝时，除了多次遣使到苦县祭拜老子外，还亲祀老子于濯龙宫。老子逐渐被神化，竟至成了道教的教祖，以《道德经》编列诸经之首。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跟道家老子确实具有某些历史的渊源关系。

汉刘歆《七略》，道家与神仙家原分为二，各自为录，只是到了后世，道教与古神仙说关系才密切起来。但是，作为宗教信仰的基本标志之一必须有个至上神的观念。道家的《老子》和《庄子》都没有这种思想言论，它摆脱了殷周以来上帝和天神的传统宗教信仰，大力描述一种宇宙的绝对精神（“道”）作为至高无上的支配力量。

《庄子》分内外篇，代表庄周思想的内篇，主张齐生死，认

为生不足乐，死不足哀，生死听其自然。根本不主张炼养形体，幻想成仙。至于后来出现的外篇里说到“吹响呼吸，吐故纳新”，固然属于后世道教讲习的导引的方术，进一步还企图长生不死。那是庄子学派后来的事了。

道教思想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它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哲学科学、伦理道德等息息相关。宗教理论的一个特点，它往往不是直接地正面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所谓天神的意志曲折地颠倒地反映出来。比如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论述天地万物的生成，本是采用汉代流行的元气论，是一种近似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但是通过宗教神学表达的方式，归根到底，不能不承认天神的主宰作用。如果我们不顾全书庞杂的松散体系的特殊情况，一味执着、过度重视这种神学表达的方式，那末可能满眼只见神灵，不见神灵之外还有当时流行的元气论的影响和作用了。

原始道教思想的发生是当社会政治经济遭受危机的时候，因此世俗的思想家热心探讨它，企图挽救它；道教的理论家也应运而生，以宗教神学的方式寻找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太平经》里要求改良政治，任用贤才，减省刑罚，沟通民意；并且提出了反映劳动人民反对剥削、自食其力、救穷互助等主张，都是针对着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的痼疾而做的各种设想和幻想。由于它是宗教的经典，所有那些设想和幻想，都通过天志和神意表达出来，就不足为奇了。无论世俗的思想家或原始道教的理论家都抱着一个殊途同归的目标，就是想望物富人寿、国泰民安。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不单是依靠一种思想意识宣讲的活动，除抽象的理论外，还有各种各样众多的方术配合着进行，借以达到自己的宗教的愿望并且吸引广大群众的信仰。

一些初期道教的经典，各自成为宗派，有专门系统的论述，后世的学者纷纷踵事增演，往往影响深远。例如后汉魏伯阳撰的

《周易参同契》是专论炼丹的最早的道书，号称丹经之祖。后世有不少撰述，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阐释它，发挥它，甚至造说参同古本和龙虎古经，成为有关《参同契》专门的学问。又如魏晋之际问世的《黄庭经》，描述人身的五脏、六腑、三关、丹田的炼养，书分《内景经》和《外景经》两种，后代注解和敷演《黄庭经》的著作很多，蔚然成为黄庭学。由此可见，早期道教的经典往往成为后世某派道书理论的渊薮，犹如儒家经典后来之有某些经师的传诂注疏一般。

晋朝葛洪的神仙道教思想，反映了那个飘零没落的士族子弟代表当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纷至沓来的时候，精神上感到十分迷惘和愁苦，起初还想以儒术挽救衰世，终至悲观失望，逃避现实，皈依神仙道教以自慰。神仙道教的形成，主要在上层社会开展活动，是作为初期民间道教的对立教派而出现的。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具有玄秘的理论和方术，在众多方术中首推金丹，其次“仙药”，他在这两方面，客观上类似科学实验和研究，用功最深，成绩最大，在祖国文化史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它是集汉魏以来道教思想和仙术的大成。

上清经派是晋代一个较大的道教派系，它的师承历历可数。梁陶弘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源似清而流长，它的教义和思想的演变，值得深入探讨。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与我国黄老之道相比附，发挥传佈的作用。后汉明帝时，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道与佛并行不悖。经魏晋至南北朝，道教与佛教既有抗衡的一面，又有相互渗透、交相影响的情况。北魏寇谦之提倡新天师道，排斥佛教。南朝梁陶弘景悉心宣扬神仙道教，兼信佛法，在其整理编纂的道书《真诰》中，已经吸收了释氏《四十二章经》的学说。他认为信教的目的在于“崇善”，所以对于道、释、儒三教都没有偏执一法的必要。当时统治阶级最高的首脑梁武帝萧衍基本上也

是采取同样的态度。南朝的士大夫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佛、道两教大体能够调和，这跟北魏门阀士族崔浩联结嵩山道士寇谦之，大事政治活动，进行道教抨击佛教的斗争，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种宗教或宗教派别的开始形成，自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一旦创立以后，就能相对独立地开展活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都可以信仰它，利用它。如东汉三张（张陵、张衡、张鲁）的五斗米道原来发生于民间，在社会下层活动，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后来东晋著名士族王羲之一家，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即天师道），他的儿子王凝之信奉尤笃。同时侯的孙恩亦尊奉五斗米道，但是孙恩继他的叔父孙泰举兵起义，把会稽内史王凝之杀了。从这次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五斗米道的信徒们因阶级利益不同，互相对抗。这时五斗米道本身并不带有哪个阶级的政治色彩，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被不同地位的人们利用罢了。统治者利用它，梦想保佑自己的利益；被压迫的人们利用它作为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壮大自己、打击敌人的手段和力量。

自从原始道教成立以后，我国历代农民起义与宗教关系的大致情况是：初则利用道教，如后汉末年太平道的张角、五斗米道的张脩和张鲁；晋南北朝有所谓李脱、李弘等。继则隋唐至宋元时期，利用佛教的弥勒菩萨。宋代又利用外来的摩尼教（如北宋方腊），而摩尼教又兼奉早期道教的张角来壮大力量。近代太平天国革命则利用基督教，宣传农民革命思想。如此等等。我国历史上农民暴动、农民战争，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往往与宗教结不解之缘。因为民间宗教的吸引对象就在于广大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生灵之中。

道教典籍，浩如烟海，杂而多端。一个困难的问题，有许多道书，撰人不详，著作的年代不明。或系后人假托前圣，或系真伪混杂，缺佚繁多。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作些考证和补苴辑佚

的工作。否则，这些原始资料，宛如荆棘丛生、未曾开垦的荒丘，将无法利用为耕植之地。

我素爱好中国哲学思想史，作为思想史的一个方面，研习道教经典，始于三十年代的末叶。时断时续，未遑专心致志。解放前发表的文章，偏尚考证。因旧刊绝迹于书肆，海内外都难见到。这次，选录了《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老子河上公章句考》、《黄庭经考》等四篇。其余十三篇中，九篇系论述文章，另四篇属考证文字。全书分为上下编，大抵是多年来先后写成的。在我发表过的几类文章中，选辑道家和道教思想为一类，加上个别未曾发表的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的同志建议题名《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我同意了。这些文章，撰写的时间或先或后，基本观点尚无变更。为了保持文章的本来面目，现在只是将个别的字句略事修订，供对中国思想史、道教史有兴趣的同志们参考。其中舛误和不妥之处，自知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王 明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目 录

序言

上编

论老子	3
论老子兵书	27
论庄周	37
论葛洪	55
论陶弘景	80
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思想演变	99
论《太平经》的思想	108
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	139
论《无能子》的哲学思想	159

下编

论《太平经》的成书时代和作者	183
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	201
《太平经》目录考	215
敦煌古写本《太平经》文字残页	238
《周易参同契》考证	241
《老子河上公章句》考	293
《黄庭经》考	324
农民起义所称的李弘和弥勒	372

上 编

论 老 聽

一、引 言

老聃^①为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家的名称，虽起于西汉，但象《庄子·天下》所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已经描绘了道家的基本精神。关尹，只有历史传说，并无真实的记载。《汉书·艺文志》著录《关尹子》九篇，云：“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表明了关尹喜与老聃的关系。然而《关尹子》九篇已亡，现今通行本的《关尹子》是后世伪造的书。所以秦以前关尹子的学说，除了《天下篇》所提到的几句以外，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研究。可供研究的只有所谓老聃的《老子》，它是先秦道家学派较早的学说。战国末年，韩非喜黄老刑名之学，曾著《解老》、《喻老》两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传老聃之学的有三家：《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另外，还有刘向《说老子》四篇。他们的书虽然已经亡失，但可以想见，老聃的学说曾是很流行的。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两个本子，表明汉初老聃思想盛行，很被重视，所以殉葬物里有《老子》书，而且有两个不同的本子。

① 老聃是否就是老子的名字，如今还是一个悬案（详第二节）。这里所用老聃，只是因袭着传统的说法。

老聃不仅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而且后来被奉为道教的教祖，称“太上老君”，他的学说，长期支配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封建地主阶级利用他维护自己的统治，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有的也有利用他作为动员、组织群众的工具，来反抗封建统治者。

老聃，在我国哲学思想史上占很重要的位置，他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在《老子》书里，提出了一连串宇宙万物生成的理论。尤其可贵的，它概括了自然现象的变化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观察，提出了比较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以诗体行文，文辞简炼，有些名句、格言，世代传诵，深入人心。历代思想家，纷纷以自己的观点加以诠释，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都有，发生着不同的影响。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老子》这部书确很重要，有必要加以述评。至于老聃其人，传说不一，也应做扼要的叙述并提出一些看法。

二、有关老聃其人的传说

最早传述老聃其人的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所记的老聃，有姓、有名、有字、有谥号，曰：“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他的籍贯有国、有县、有乡、又有里，曰：“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接着记老子跟同时代接触和对话的人物有关令尹喜和孔丘。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老子的世系也写得那末清楚：“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邦太傅，因家于齐焉。”单看这些各自的详细记载，老聃即老子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司马迁在这篇《列传》里记老聃的同时，还记老莱子和太史儋两人。对老聃、老莱子、太史儋三人，

究竟谁是真老子，始终没有肯定。

关于太史儋，则言：“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显然，儋与上述亲自同孔丘对话的老聃，不是一个人。可是，这事即使是司马迁同时的人也搞不清楚：“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至于老莱子，司马迁记老聃与太史儋二人之间插进这么几句：“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说：孔子所严事的前辈，“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看来，老莱子不是老聃。但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我们觉得张守节的揣测是有一定迹象可据的。《列传》里记老聃对孔丘讲过这么几句话：“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这几句话的本原，据刘汝霖《周秦诸子考》说，是从《庄子·外物篇》来的。^①《外物篇》载老莱子对孔丘说：“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这里有个小小的曲折过程：在《庄子》里的“老莱子”，到《史记》里变成“老子”了。这表明太史公在《列传》里插进老莱子，正是当时有人怀疑老子或是老莱子的缘故。

根据以上所述，老莱子、太史儋同老聃是否是一个人，在《史记》里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这是不是太史公故弄玄虚令人苦心猜想呢？不是。因为他当时见到一些有关老聃传说的材料，互相矛盾，单个来看，似乎各有所据，但若互相参校，则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与其偏信一端，辄下断语，不如俱存，以示客观实录。这也许是大史学家的用心良苦吧。

《列传》记孔丘适周问礼于老聃，老聃对孔丘的谈话，前面已经叙述，是根据《庄子·外物篇》敷衍而成。至于孔丘对老聃

^① 梁启超也已经笼统地提出过，见《古史辨》第四册。

的赞叹，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这些赞语，刘汝霖认为源出于《庄子·天运篇》：孔丘见老聃归，孔丘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列传》里写孔丘问礼于老聃的传说，都是取材于道家传说的系统，这是应该注意的一点。

在同一件事情上，还有另外一个传说的系统，就是儒家的传说。《礼记·曾子问篇》记载孔丘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一则以及记孔丘说“吾闻诸老聃曰”三则，都表明老聃是深明于礼的。这个儒家系统的传说，司马迁在《列传》里没有采用。但他在《孔子世家》里说了孔丘“适周问礼，盖见老子”的话。两个系统的传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老聃与孔丘同时代，老聃是前辈，是知礼守礼的人，所以孔丘向老聃问礼。可是这两个系统的传说的时代，与司马迁记述的老子世系，出入很大。清代著名学者汪中对于这个问题解决得较好，他说：“孔子所问礼者，聃也，其人为周守藏之史，言与行，则《曾子问》所载者是也。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本纪在献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①，则为儋之子无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其入秦见献公，即去周至关之事。或曰，儋即老子，其言糙（是）矣。”^② 汪中的说法，一把两个传说系统的孔丘问礼于老聃排除出去，认为那是很早以前的另外一回事。二把老聃世系同太史儋联系起来，确定老子是太史儋，是战国时人，为《道德经》的作者。这个考证，得到近人梁启超、罗根泽、钱宾四等人的赞赏^③。我们也以为汪中的《考异》很有见地，不但解决

① 《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将段干子，请予南阳以和。《战国策》：华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六国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军。按是时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

② 《述学》补遗《老子考异》。

③ 《古史辨》第四册下编。钱说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

了老子究为何人的问题，连《老子》成书的时代也适当地解决了。

三、《老子》成书的时代问题

如果承认孔丘问礼于老聃的传说是一回事，著《老子》上下篇五千余言的作者是另外一回事，不与上述老聃相混淆，那末，《老子》成书的时代，依其文字的若干特征，应当定于战国。现在综合诸家所说和个人所见，提出如下几点重要根据：

1. 从一些名词和制度考察，认为现行本《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例如，“万乘”一词，不见于战国以前的著作，而《老子》第二十六章则云：“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韩非子·喻老篇》举例说：赵“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其它战国时期的书里用万乘一词的可以举出很多，如：

今万乘之国。①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②

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③

与孟轲同时的齐人孙膑，著兵法，亡失已久。一九七二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里发现大批竹简中，有《孙膑兵法》残籍，其《八阵篇》云：“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但春秋时的《孙子兵法·作战篇》则只说“革车千乘”，而不是万乘字样。万乘，指兵车万乘。四匹马驾一车叫乘。拥有兵车万乘的国，叫万乘之国；拥有兵车万乘的国君，称万乘之主。“万乘”一词，反映着战国时大国的实力。春秋时，诸侯国还没有具备这个条件，这是一个区别的标志。

① 《墨子·非攻中篇》。

② 《孟子·梁惠王上篇》。

③ 《孟子·公孙丑下篇》。

又如，在军事制度上，上将军的名称，战国前也没有，而《老子》第三十一章则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事处之。”“上将军”殆始见于秦楚之际，去六国尚近，还沿六国的余习。《史记·项羽本纪》云：楚“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悦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宋义既任上将军，总揽全军的大权。次将项羽，末将范增等皆在其下。后来项羽杀了宋义，诸将乃共立项羽为假上将军。这事报告给楚怀王，怀王才确认项羽为上将军。

2. 从思想脉络的先后推断《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在《老子》书里，对于已往哲学家的思想，有接受的，也有反对的。反对的，如第三章云：“不尚贤，使民不争。”按尚贤学说，倡自墨翟。《墨子》书中明白载有《尚贤篇》。但《老子》表示反对，认为不提倡尚贤的学说，才能使老百姓不会起而斗争。因为墨子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①《老子》则反对有才能的农民和手工业人参预政治。从这里，透露出一项重要的消息，就是《老子》上下篇，大约成书于墨翟之后。

还有，《老子》第三十八章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里道、德、仁、义、礼，构成一个递次发展的系统。道家认为“道”和“德”是最高的范畴，凌驾于仁、义之上。“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仁、义、礼被不同时期的儒家所重视，加以鼓吹。《老子》的作者设想仁、义、礼递相消长，首先从“道”和“德”的消失所引起。道家以自然主义反对儒家的政治和伦理学说，带有每况愈下的痛惜和不满的情绪。这也表明战国时期才有这样的思

① 《墨子·尚贤上篇》。